

东亚^①货币合作的阶段确定与形态选择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戴金平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熊性美

摘要: 东亚金融危机表明东亚进行货币合作迫在眉睫, 而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成功为东亚货币合作提供了范例。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诸多问题中, 关键的问题是确定目前货币合作的阶段和形态。本文就若干货币合作的条件指标, 对东亚地区目前的水平与西欧国家1979年的水平进行了比较, 结论是, 东亚货币合作目前只能在第一个阶段——准备阶段运作, 建立真正的、有制度框架保障的、以汇率目标区为主体的货币合作体系的基本条件尚不具备。然后, 文章就当前阶段货币合作的形态选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指出, 在货币合作初期, 对称性的货币合作比较合适。

关键词: 东亚货币合作; 欧洲经济共同体; 汇率稳定; 对称性合作

Key Words: East Asian Currency Cooperation;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Foreign Exchange Rate Stabilization; Symmetrical Cooperation

国际货币合作是在多国或两国之间进行的关于维持汇率稳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货币合作的目的是实现双边或多边汇率的稳定, 合作的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 共同干预市场等。货币一体化是货币合作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由松散型向紧密型过渡的一个过程。尽管国际货币体系向什么方向发展上存在很大争议, 但是在世界范围或区域范围寻求货币合作, 实现汇率的相对稳定, 是目前一个达成共识的次优选择。东亚地区如何通过货币合作实现汇率的稳定, 是目前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一个中心内容。本文具体探讨目前东亚货币合作的阶段以及该阶段货币合作的形态。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阶段确定——初级阶段的特征

(一) 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还比较低, 货币合作的基础薄弱

目前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两个框架下进行, 一个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一个是次区域的东盟组织, 两个框架的基本目标是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APEC是一个连接亚洲和太平洋国家的、松散的、关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论坛, 内涵的国家众多, 差异性极大, 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受到多方面的障

碍。东盟是一个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涵盖的经济体规模太小, 区域内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很小。

这里, 我们主要选取三个指标来考察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程度: 区域内贸易占各国GDP的比重、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各国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

在分析这些指标时, 我们需要与欧洲货币一体化相比较, C.H. Kwan(1998)^②将目前的东亚指标与欧盟目前的指标相比较。欧洲共同体1979年建立了一个货币一体化的制度框架, 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合作从此开始; 在此之前, 1958年—1978年处于货币合作的准备阶段。如果我们现在要探讨东亚目前是否具有建立真正货币合作制度框架的条件, 我们应该将东亚目前的水平与欧洲共同体70年代或1979年的各项指标相比较。

从表1到表4, 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 东亚是36.7%, 欧洲共同体是55.9%; 区域内贸易占GDP的比重, 东亚是40.58%, 欧洲共同体是39.46%; 东亚各国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之和为9.98(45个), 平均

^① 东亚在此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十个国家和地区。

^② C.H.Kwan: 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nd ten Possibility of Forming a Yen Bloc in Asi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9(4), 1998.

相关系数为0.40, 欧洲共同体为13.23, 平均值为0.63。除了区域内贸易占GDP的比重, 东亚地区和欧洲共同体水平基本相同之外, 其他指标东亚地区还存在明显差距。东亚目前的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还不高, 反映的是区域内自由贸易的程度和共同市场的建设还远远不够。

(二)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还不具备, 各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根据以蒙代尔、麦金农为代表的最优货币区的基本观点, 具有下列特征的国家适合组成货币合作区: 工资价格充分弹性、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较高、经济开放度较高、经济冲击对称等等。

1. 对外经济开放度

长期以来, 很多人用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国的对外开放度。在国际经济发展的内涵日益丰富、远非国际贸易活动可以涵盖的今天, 这种指标显然很不合理(熊性美, 陈漓高 1992, 李渊1998)^①。经济开放度可用综合开放度来衡量, 综合开放度体现一国贸易、投资、金融三方面与世界经济融合的程度。李渊(1998)在计算综合开放度时, 分别给予对外贸易比率、对外金融比率和对外投资比率0.4、0.3、0.3的权重。我们认为, 在国际经济活动日益丰富和复杂的今天, 国际金融活动和国际投资活动的重要性已经大大提高, 在体现一国国际化程度各项指标中的地位绝不亚于对外贸易比率, 所以, 在我们的计算中, 给予三项指标同一的权重。

从表5看出, 东亚地区的综合开放度国别(地区)差异较大,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区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 对外开放度很高; 而中国、日本、韩国作为大国, 综合开放度指标较低。就平均水平而言, 东亚地区的开放度要高于西欧地区, 这部分地反映了东亚地区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较高。

2. 工资价格弹性

东亚地区四个方面的特征使工资和价格具有较大的弹性。第一, 东亚地区是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地区, 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刚刚完成(与欧美国家相比), 如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日本, 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正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化的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转移, 这种转移在满足了工业化过程中对城市劳动力的巨大需求的同时, 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第二, 东亚国家和地区一般都不制订最低工资法、雇员税法 and 就业保障法等法规, 使工资完全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 劳动力市场基本上不

发生扭曲(杜方利, 1998)^②。第三, 东亚国家工会的力量与欧美国家相比比较弱小, 谈判能力低; 失业保险制度也不健全。导致工资刚性不强。第四, 日本是东亚国家工业化完成最早的国家, 各方面的法规相对比较健全。但是日本的终身雇用制度也保证了工资的充分弹性。在终身雇用制度下, 劳动力需求下降时企业不裁员, 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方法是削减工资水平。

工资构成企业成本的最重要部分, 工资的较高弹性保障了产品价格的较高弹性。

3. 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

东亚各国和地区目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很多, 包括语言障碍、法律障碍、文化障碍、政治障碍等等, 这都使东亚整个地区劳动力的流动程度很低。

可以用金融深化的程度来反映资本的流动性, 因为金融深化是资本充分流动的物质基础。金融深化的程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反映, 一是政府对金融的管制程度, 如利率管制、外汇管制、资本流动管制、金融业准入管制等等, 二是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 如金融机构的数量、金融工具的丰富程度、国际金融设施等等。

东亚各国(地区)金融发展的水平存在很大差异, 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中国香港、新加坡组成, 该类国家和地区金融深化的程度较高, 是地区性的金融中心, 基本不存在资本流动的障碍。第二类由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和日本组成, 该类国家或地区正处于金融深化的过程中, 政府对金融的管制已经大大放松, 金融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第三类由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组成, 这类国家(地区)金融自由化起步较晚, 目前存在较多的政府对金融的管制, 资本流动的政策和市场障碍都很大。由于该地区的大国——中国、韩国和日本都有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 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 致使整个东亚地区的资本流动性不高。

4. 经济冲击的对称性

经济冲击的对称性取决于经济结构的相似性, 相似性越高, 冲击的对称性越高。这里我们选取两个指标反映经济结构的相似性: 贸易结构和资本形成比率。

表6计算了东亚各国(地区)1985—1999年期间平均的资本形成比率、东亚地区的平均资本形成比率、资本

① 熊性美、陈漓高:《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2年。

李渊:“我国对外开放度的度量与比较”,《经济研究》, 1998年第1期。

② 杜方利:《东亚经济的崛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8年。

形成比率的标准差。标准差反映东亚各国(地区)偏离平均资本形成比率的程度。该指标的高低粗略反映了一个地区各国资本形成比率的相似性。标准差越高,相似性越低。表7给出了欧洲共同体各国1979年的资本形成比率。东亚地区标准差明显高于欧洲共同体的标准差,说明东亚地区资本形成比率的相似性大大低于欧洲共同体1979年的水平。

从进出口结构的差异度来看,东亚地区1993年出口的差异度指标的平均值为58.56,进口差异度指标的平均值为34.47;而欧洲国家1979年这两项指标分别为35.70和23.20。

东亚地区进出口结构差异明显高于欧洲共同体。

5. 政策目标的相似性

政策目标相似性越高,在对付经济冲击时货币合作各国政策协调越容易,货币合作越容易成功。

我们选取了通货膨胀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来考察。表12和表13列出了东亚地区90年代和欧洲共同体70年代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及各地区通货膨胀率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东亚地区标准差是5.2,欧洲共同体是3.73,东亚明显高于西欧地区。

结论1: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目前的东亚地区还不具备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有制度保障、以汇率目标区为主体的如同欧洲货币体系的货币合作机制的条件。确切来讲,目前处于货币合作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可以说是货币合作的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的货币合作属于低级形态的货币合作,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过程中一个辅助的、次要的合作行为。这个时期体现为以下特征:

第一,双边性。由于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还处于一个中级阶段,货币一体化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一些经济贸易联系密切、经济一体化进展较为顺利的国家之间就产生了在货币一体化方面进一步行动的意愿和可能性,但是整个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存在差异,货币合作便经常在两国或三国之间进行。以两国或几国签订协议的形式存在。

第二,一般还没有涉及汇率稳定的严格的框架协议,只是进行汇率稳定的尝试性的合作,如建立双边的或多边的政府货币互换协议,紧急时刻货币援助的协议,共同干预市场汇率的行动等等。还没有形成汇率目标区计划。

第三,宣传期。关于货币一体化的讨论十分热烈,

从学者到实业界人士,以致政府,探讨货币合作的形态、工具和阶段,在不同的框架和范围内进行国际间的协商,各国都提出各种不同的方案,对于货币合作存在激烈的争论。

第四,一个相当重要的特征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还没有进入高级阶段,贸易投资内部关联度还没有到一个高级阶段。距离最优货币区的条件还存在距离。

事实上,在欧洲货币体系建立之前,欧洲的货币合作一直处于准备阶段,即第一阶段。从罗马条约到蛇行汇率体系,处处都可以发现货币合作的痕迹。但是,当时的货币合作还只是实体经济一体化辅助的、次要的内容,货币合作还只局限于方案的讨论,汇率合作局限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度框架下,还未形成欧洲共同体独立的汇率合作框架。

二、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形态选择——对称性与非对称性

货币合作的实质是协调区域内的货币存量和利率水平,根据协调的性质不同,货币合作存在对称合作和非对称合作两个形态。对称性合作是指参与国联合决定货币存量和利率水平;在面临冲击时,调整的责任分配是对称的。非对称合作是指允许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自行决定自己的货币存量和利率水平,其他国家根据领导国的货币存量和利率水平决定自己的货币存量和利率水平;在面临冲击时,调整的责任是不对称的。

现在我们采用一个简单的两国模型分析说明对称合作和非对称合作的性质。

假设货币合作在两个国家之间进行,两国存在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忽略货币乘数,货币供给等于国内信贷和外汇储备之和;资本充分自由流动,利率平价成立。 M^D 、 M^S 、 r 分别表示货币需求、货币供给、利率,下标A、B表示国别。

1. 对称性合作

在这种形态中,两国联合确定初始的货币供应量,货币供给线和货币需求线相交形成均衡货币存量和同一的利率。当冲击来临时,两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共同确定新的货币供给。例如,市场预期B国货币贬值,纷纷抛出B国货币,购入A国货币,汇率变动的预期也会使B国利率相对于A国利率而提高。为了稳定汇率,B国中央银行买入B币,卖出A币。汇率得到稳定,同时B国货币供给减少,A国货币供给增加,两国利率水平出现

一定程度的差异。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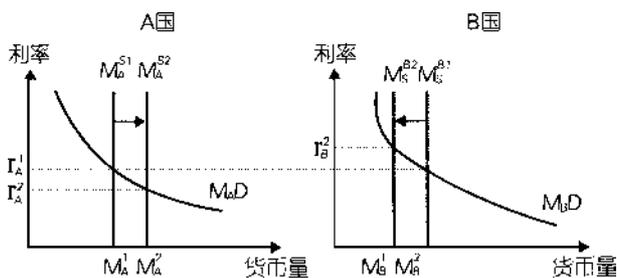


图1

对称性合作的结果是货币合作区的货币供给保持不变，一国货币供给的增加量恰好是另一国货币供给量的减少。在对称性合作下，一国的经济衰退或经济膨胀可以通过货币合作而得到缓解。如果A国发生了衰退，货币需求下降，形成利率下降压力，市场对该国形成贬值预期，抛出该国货币，为了维持固定汇率，该国中央银行在市场上购买本国货币。由于是对称性合作，B国不进行抵消性干预，B国的货币供给扩大，于是在新的利率水平上形成世界均衡。就合作区来讲，利率下降了，衰退国的衰退状况得到了缓解。

上述过程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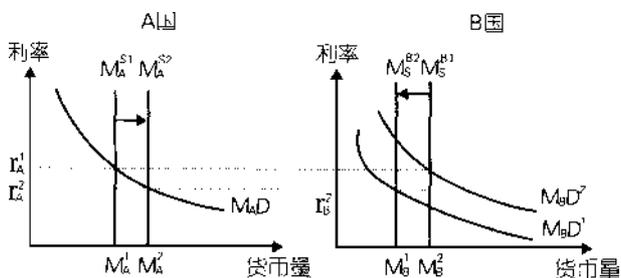


图2

2. 非对称性合作

非对称性合作是指在应对外部或内部冲击时，强国为了稳定本国的货币供给而进行货币冲销干预，保持本国的货币供给不变，使维持汇率稳定的责任单方面落在了弱国身上。如图3所示。

市场预期B国货币贬值，抛售B币，为了维持固定汇率，B国在外汇市场上购买本币，导致本国货币供给降低为MS^{B2}。A国为了保持本国货币供给不变，在市场上进行冲销干预，购进A币；重新对B国形成贬值压力，迫使B国紧缩国内信贷，进一步将货币供给降为MS^{B3}，结果是，B国在利率r³上形成暂时的均衡。B国为了保持汇率的稳定，使利率从r¹提高到r³，国内经济形成严重的紧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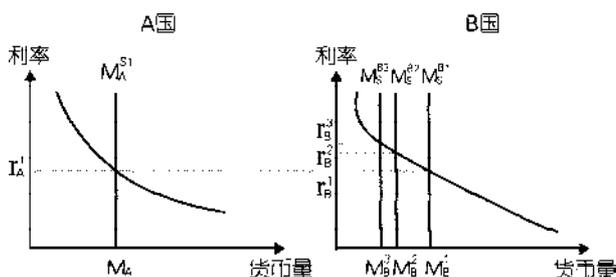


图3

在货币合作区经济周期不同步的情况下，非对称性合作会加大衰退国或膨胀国的经济紧缩压力或通货膨胀压力。当B国面临经济衰退，货币需求下降，形成利率下降压力，市场预期B国币值下降，抛售B币，购入A币。为了维持市场汇率稳定，B国中央银行购进本国货币。B国的货币供给下降。A国要保持本国的货币供给量不变，在市场上进行冲销干预，购进B国货币，抛出本国货币；B国形成新的贬值压力，不得不紧缩国内信贷，使货币供给进一步下降，直到在原来的利率水平上形成货币均衡。B国的货币供给下降的幅度很大，形成国内严重的经济紧缩。上述过程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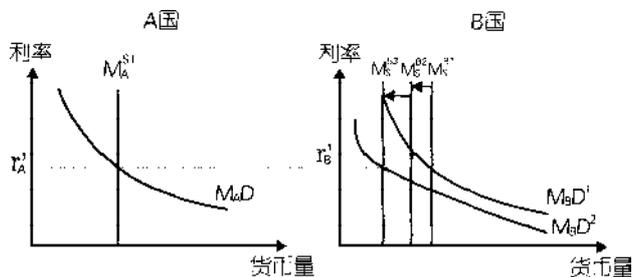


图4

3. 对称性合作和非对称性合作的比较

第一，货币政策自由度的分配不同。在对称性合作下，汇率固定下货币政策的一个自由度由合作国家共同拥有，合作国共同承担调整的责任，共同承担维持汇率稳定的责任。在非对称体系下，货币政策的一个自由度由强国拥有，调整和维持汇率稳定的责任由弱国来承担。第二，经济衰退或膨胀的调整功能不同。在货币合作区内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经济周期时，当一国面临经济衰退或通货膨胀时，货币合作对衰退或膨胀的调节功能在不同的合作机制下有不同的表现。在对称体系下，货币合作可以缓解某一成员国的经济衰退或膨胀，而在非对称体系下，货币合作强化某一成员国的经济衰退或膨胀。第三，对成员国的货币约束力不同。固定汇

率制度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形成一个强大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称为固定汇率制度的“纪律”。在货币合作体系下,从本质上说,合作体系本身对所有成员国都形成某种程度的货币政策的约束,换言之,货币政策的目标之一是维持汇率的稳定。但是不同的货币合作机制这种约束力的大小不同。在对称体系下,货币政策的约束力要小一些,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外溢效应;在非对称体系下,中心国对外围国形成巨大的约束力,外围国任何货币政策的自主行为导致的后果完全由自己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外围国政府经常是在是不是加入货币合作的问题上犹豫徘徊,或者是经常会产生中心和外围国的矛盾摩擦,就货币合作的规则进行重新讨论和调整。

结论2:在货币合作的初期,当成员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联系还不是特别紧密时,各国面临非对称性冲击比较多时,尤其是进行货币合作的政治障碍较大时,采取对称性的货币合作更佳。在东亚货币合作的初期,考虑到东亚的实际情况(多个大国并存、政治矛盾较深、经济结构存在一定差异),应该采取对称性的货币合作机制。

表4 欧洲共同体经济增长率的相关性

	丹麦	法国	西德	希腊	意大利	荷兰	英国
丹麦		0.872	0.812	0.223	0.888	1.000	0.712
法国			0.958	0.112	1.000	0.963	0.748
西德				-0.090	0.973	0.960	0.880
希腊					0.002	0.521	0.555
意大利						0.960	0.720
荷兰							0.416
英国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经济年鉴》1975—1979年相关国家GDP的增长率计算。

表3 东亚各国(地区)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

	韩国	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	新加坡	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	中国	日本
韩国		0.581	0.818	0.451	0.867	0.642	0.314	0.842	0.165	0.740
中国台湾			0.841	0.330	0.371	0.237	0.362	0.411	0.081	0.429
中国香港				0.477	0.663	0.507	0.429	0.619	0.258	0.466
新加坡					0.636	0.858	0.675	0.650	-0.021	0.272
印尼						0.883	0.391	0.864	0.126	0.607
马来西亚							0.547	0.788	0.018	0.432
菲律宾								0.351	-0.429	0.126
泰国									0.081	0.730
中国										0.007
日本										

资料来源:根据 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2000 1985—1999年东亚各国的GDP增长率计算。

表1 东亚各国(地区)区域内贸易、贸易总额与GDP(1999年)
(单位:百万美元、%)

国家(地区)	区域内贸易(1)	贸易总额(2)	GDP(3)	(1)/(2)	(1)/(3)
韩国	57980	264495	406940	21.92	14.25
中国香港	166722	353405	158685	47.20	105.00
新加坡	81683	207386	84945	39.40	96.20
印度尼西亚	27769	72669	136866	38.21	20.30
马来西亚	50063	149421	78735	33.50	63.60
菲律宾	19095	67534	74656	28.30	25.60
泰国	29503	99918	123986	29.50	23.80
中国	116709	360938	991194	32.30	11.80
日本	204867	730629	4348828	28.04	4.70
平均				36.70	40.58

资料来源: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2000, 6。

表2 欧洲共同体区域内贸易、贸易总额和GDP(1979年)
(单位:百万美元、%)

	贸易总额(1)	区域内贸易总额(2)	(2)/(1)	GDP(3)	(2)/(3)
法国	207701	105374	50.73	461185	22.85
西德	331454	160062	48.29	759600	21.07
意大利	150125	70029	46.65	325898	21.49
比利时	117614	82480	70.13	111157	74.20
荷兰	131888	85041	64.48	157507	54.00
英国	185997	80543	43.30	416640	19.33
爱尔兰	17027	12629	74.17	16210	77.90
丹麦	33098	16358	49.42	65936	24.81
平均			55.90		39.46

资料来源: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1985,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1986。

表5 东亚(1998年)和西欧(1979年)各国(地区)的综合对外开放度 (单位:10亿美元、%)

国别	GDP(1)	贸易总额(2)	金融资产负债总额(3)	对外和外来投资总额(4)	对外贸易比率(2)/(1)	对外金融比率(3)/(1)	对外投资比率(4)/(1)	综合对外开放度*
欧洲平均								43.87
比利时	111.16	117.61	111.98	11.900	105.00	101.00	11.00	76.00
英国	416.64	186.00	577.69	10.160	44.70	138.70	2.4	61.90
法国	461.19	207.70	287.06	3.560	45.04	62.24	0.77	36.02
荷兰	157.51	131.89	122.80	4.472	83.70	77.97	2.84	54.84
意大利	325.90	150.13	238.40	0.930	46.10	73.15	0.29	26.53
丹麦	65.94	33.10	12.79	0.100	50.20	19.40	0.15	23.25
爱尔兰	16.20	17.03	3.94	0.190	105.10	24.30	1.17	43.52
德国	759.60	331.50	252.40	74.590	43.64	33.23	9.82	28.90
东亚平均								87.26
中国	964.60	323.90	295.90	46.400	33.60	30.70	4.80	23.00
日本	4312.30	755.20	1762.30	27.900	17.50	40.90	0.60	19.70
中国香港	162.80	385.50	1035.40	31.700	220.20	636.00	19.50	291.90
新加坡	83.40	358.60	170.70	7.000	430.00	204.70	8.40	214.40
马来西亚	74.90	135.50	40.80	2.200	180.90	54.50	2.90	79.40
泰国	126.30	108.80	82.40	12.600	86.10	6.20	10.00	34.10
印尼	117.50	76.20	61.40	0.400	64.90	52.30	0.30	39.20
韩国	369.10	225.60	136.20	10.100	61.10	36.90	2.70	33.60
菲律宾	68.60	63.90	36.70	2.500	93.10	53.50	3.60	50.10

资料来源:根据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1985&2000计算。注:综合开放度=1/3(对外贸易比率+对外投资比率+对外金融比率)。

表6 东亚各国(地区)资本形成/GDP的比率(1985年—1999年)

国别	韩国	中国香港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	中国	日本	平均值	标准差
1985-1999平均值	34.19	30.21	35.54	31.47	35.97	22.26	36.11	38.86	28.99	32.84	5.012

资料来源:根据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2000 有关资料计算。注:日本的资本形成和GDP均采用第四季度的数值。

表7 欧洲共同体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1979年)

比利时	丹麦	德国	英国	法国	爱尔兰	荷兰	意大利	平均值	标准差
20.44	20.89	21.80	18.77	21.48	30.69	21.04	18.85	21.76	3.78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1986。

表8 东亚各国(地区)出口贸易结构的差异度(1993年)

	韩国	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	中国	日本	美国
韩国	0										
中国台湾	5	0									
中国香港	33	28	0								
新加坡	51	56	84	0							
印度尼西亚	81	80	80	100	0						
马来西亚	57	58	86	30	72	0					
菲律宾	48	43	33	73	47	67	0				
泰国	42	41	45	55	45	41	26	0			
中国	53	48	24	80	56	82	15	41	0		
日本	51	56	84	64	126	64	99	81	104	0	
美国	75	40	68	16	88	34	61	51	66	38	0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 1995年》有关资料计算。

注:出口差异度=|两国初级产品出口差|-|两国制成品出口差|+|两国机器出口差|。

表9 东亚各国(地区)进口贸易结构的差异度(1993年)

	韩国	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	中国	日本	美国
韩国	0										
中国台湾	26	0									
中国香港	64	40	0								
新加坡	34	18	50	0							
印度尼西亚	26	4	44	14	0						
马来西亚	43	29	51	11	25	0					
菲律宾	28	16	28	34	24	45	0				
泰国	35	9	41	9	9	20	15	0			
中国	43	17	27	23	17	43	19	14	0		
日本	35	55	81	65	55	76	53	64	72	0	
美国	36	10	36	14	10	23	22	5	9	65	0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5年》有关资料计算。

注:进口差异度=|两国初级产品进口差|+|两国制成品进口差|+|两国机器进口差|。

表10 西欧各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差异度(1979年)

	德国	英国	意大利	荷兰	比利时	丹麦	爱尔兰	法国
德国	0							
英国	20	0						
意大利	30	22	0					
荷兰	66	46	58	0				
比利时	44	24	14	46	0			
丹麦	52	42	54	12	44	0		
爱尔兰	60	40	52	8	40	18	0	
法国	24	6	28	42	30	38	40	0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发展报告》1982年有关资料计算。

表11 西欧各国进口贸易结构的差异度(1979年)

	德国	英国	意大利	荷兰	比利时	丹麦	爱尔兰	法国
德国	0							
英国	36	0						
意大利	38	36	0					
荷兰	6	30	34	0				
比利时	14	26	40	12	0			
丹麦	8	28	38	6	6	0		
爱尔兰	28	32	52	26	14	20	0	
法国	6	30	32	2	14	8	28	0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发展报告》1982年有关资料计算。

表12 西欧9国的通货膨胀率(1970年—1980年)

国家	荷兰	德国	比利时	丹麦	法国	英国	爱尔兰	意大利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通胀率	8.4	5.1	7.6	9.7	9.7	14.4	14.5	15.3	10.6	3.7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

表13 东亚国家(地区)1992年—1998年消费价格指数年平均增长率

中国	中国香港	日本	韩国	中国台北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平均值	标准差
10.4	7.3	0.9	5.5	3	18.1	3.8	8.1	1.8	5.4	6.3	5.2

资料来源:根据APEC秘书处《1999APEC经济展望》,1999年9月有关资料计算。

参考文献

- [1] 戴金平. 国际金融前沿发展:理论与实证方法.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 [2] 熊性美, 陈漓高. 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2.
- [3] 李洪. 我国对外开放度的度量与比较. 经济研究, 1998, (1).
- [4] 杜方利. 东亚经济的崛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8.
- [5] C.H.Kwan. 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nd Ten Possibility of Forming a Yen Bloc in Asi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9(4), 1998.

(责任编辑:戴金平)